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

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

[德] 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 ■ 著 李 鹃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

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

[德] 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 著

李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德)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著;李鹃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675-4378-2

I. ①中… II. ①沃… ②李…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古代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6664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

著 者 (德)沃尔夫

译 者 李 鹃

审读编辑 钱一栋 陈哲泓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378-2/B·986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译者导言

1721年7月12日,在普鲁士王国哈勒大学成立28周年暨副校长换任仪式上,数学及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中国人实践哲学的卸任演讲。在演讲中,沃尔夫宣扬中国人无需基督教启示、凭借自然理性就能过有德性的生活,声称中国人实践哲学的原则和自己的一样。随即,哈勒大学虔敬派神学家对沃尔夫的言论进行了激烈谴责,并向柏林宫廷指控沃尔夫公开宣传无神论。最终,在1723年11月8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以绞刑相威胁,命令沃尔夫在48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王国^①。在哲学史上,沃尔夫的演讲及其被驱逐,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性事件^②。但是,伴随着沃尔夫在德国古典哲学舞台上的销声匿迹,这场演讲本身却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

今日,我们重温沃尔夫的中国演讲,并不是为了重述中西文明

① 参见 Ludovici, *Ausführlicher Entwurf einer vollständigen Historie der Wolfischen Philosophie*, I. 2, WW III, Bd. 1. 2, 页 102 (WW 为沃尔夫全集 Christian Wolff *Gesammelte Werke* 缩写语, I 代表德语作品部分, II 代表拉丁语作品部分, III 代表资料与文献部分)。

② 参见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2001, 页 544。

交通史或海外汉学研究中常说的欧洲 18 世纪中国热,也不是要以此证明儒家思想曾对欧洲启蒙哲学产生过多么大的影响、进而挟洋自重,更不是要反过来将欧洲对中国的看法简单归结为西方意识自我投射的结果、进而强化某种自卑抑或自傲心态。因为这些态度无非都是以西方作为衡量中华文明价值的绝对标尺,它们既缺少对欧洲启蒙运动复杂理路的深入了解、又缺乏建立于中华文明主体意识之上的学术自信,往往令我们对欧洲 18 世纪启蒙哲学的研究落入各种各样流俗理解的窠臼。中国演讲之所以值得再读,首先是因为它出自沃尔夫这位当时欧洲的顶尖哲学家。这位学习神学、数学和物理学^①出身的哲学家,曾是英国皇家科学院(1710 年)、柏林科学院(1711 年)、圣彼得堡科学院(1725 年)和巴黎科学院(1733 年)欧洲四大科学院的成员。他以德语书写的一系列哲学作品,首次确立了德国哲学的基本术语体系,而且沃尔夫式的哲学体系更是从 18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主导着德国大学的哲学研究,并在神学和法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创造了康德哲学所从出的时代精神。正是凭借着哲学家特有的敏锐性,沃尔夫把握到了基督教神学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理性文明时所遭遇的问题。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既使他不同于罗马教廷中国礼仪之争的争论双方,也使他与当时借中国无神论形象来反对天主教教权的法国哲学家^②区别开来。因此,这篇演讲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质。

① 17、18 世纪的欧洲“大学”只有神学、法学和医学三个专业可供学生选择,哲学大多只作为预备课程或辅修课程,数学、物理学等也都属于哲学领域。所以,沃尔夫的专业其实是神学,他只是业余钻研哲学、数学和物理学,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有助于他解决神学问题。

② 关于法国哲学家借中国无神论形象来反对天主教教权,参见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

以下我们就从(一)沃尔夫哲学的历史地位、(二)中国演讲的历史背景、(三)中国演讲的主要内容、(四)版本及翻译说明这四个方面对沃尔夫的《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作一简要介绍。

(一) 沃尔夫哲学的历史地位

在评价沃尔夫哲学时,我们有必要区分沃尔夫研究的两个阶段:其一是沃尔夫哲学真正发挥历史效应的阶段,其二是对沃尔夫哲学进行定位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大致以1800年为界^①。在前一阶段,沃尔夫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18世纪前、中期被广为推崇到18世纪后期(乃至19世纪初期)的备受贬低。沃尔夫哲学之中的明确定义、严格推理、连贯体系等曾经被人们视为启迪人心的地方,在经过沃尔夫主义者们的教科书进一步强化之后,却又被诟病为死板不堪、冗长繁琐、固步自封。在众多批判中,最为人知的就是康德对沃尔夫独断论的批判和黑格尔对沃尔夫哲学方法的批判。所有这些,都使整个19世纪中的大多数人对沃尔夫形成了刻板的印象:一个莱布尼茨学说的体系化者和缺乏原创性与思想深度的老学究。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批评也从侧面说明了沃尔夫哲学对他之后的德国哲学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参与和影

① 1800年,施瓦布(Johann Christian Schwab)出版《康德道德原则与莱布尼茨-沃尔夫道德原则之比较》(*Vergleichung des kantischen Moralprinzips mit dem leibnizisch-wolffischen*),此书可被视为最后一部专门针对沃尔夫的论战之作,标志着沃尔夫哲学效应史进入尾声。到了1831年(同年黑格尔去世),克鲁格(Friedrich Wilhelm Kluge)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 der Philosoph*)就已经开始以回望历史的眼光重新肯定沃尔夫了。参见Biller, "Die Wolff-Diskussion 1800 bis 1882. Eine Bibliographie", in: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Interpretationen zu seiner Philosophie und deren Wirkung. Studien zu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edited by Werner Schneiders. Hamburg 1983, 页321—345。

响。因此,在审视当时德国学者针对沃尔夫所进行的论战之时,我们不应该脱离所争论问题的历史线索与时代背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位自始至终保有形而上学兴趣的康德其实说过,在纯粹理性对自己的能力进行预先批判之后,我们在形而上学中就“必须遵守著名的沃尔夫的严格方法”,沃尔夫正是“德国至今未熄灭的彻底性精神(Geist der Gründlichkeit)的创造者”^①。而且,黑格尔也说过,沃尔夫“为德国(甚至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定义了意识的世界,正如人们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阐明了人的表象能力的整个范围,他们所做对于普遍的教育极为重要”^②。因此,在这第一阶段,无论是学者的单方论战、还是普通人的片面印象,这些都只应构成我们重新理解沃尔夫的起点和契机,而远非终点和定论。

在第二阶段,当学者们不再需要通过批判沃尔夫来提出自己的学说与立场之时,沃尔夫哲学的效应史也渐入尾声,此后,人们对沃尔夫哲学的兴趣则主要来自哲学史研究领域。19 世纪的沃尔夫研究主要是历史性的^③,着重通过史料搜集来梳理、再现沃尔

①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 XXXVI.

②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and 2, Frankfurt am Main 1979, 页 261. 黑格尔对沃尔夫几何学式证明方法的诟病,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沃尔夫的主要依据。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在知性认识的方式上,沃尔夫和斯宾诺莎是一样的,不仅如此,整个近代哲学也是斯宾诺莎主义式的。只是在黑格尔看来,沃尔夫和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以及这里的亚里士多德的差别在于,他在沃尔夫那里没有看到对矛盾之本质的重视。关于一种排斥矛盾的表象思维(das vorstellende Denken)和一种视矛盾为事物之原因的思辨思维(das spekulative Denken)的区分,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关于矛盾(Widerspruch)的注释 3 中有过更清楚的表述。

③ 参见 Kluge, *Christian von Wolff, der Philosoph*, Breslau 1831; Wuttke, “Über Christian Wolff den Philosophen”, in: *Christian Wolffs eigene Lebensbeschreibung*, edited by Heinrich Wuttke, Leipzig 1841, 页 1—106; Zeller, *Wolffs Vertreibung aus Halle; der Kampf des Pietismus mit der Philosophie*, in: *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geschichtlichen Inhalts*, by Eduard Zeller. Leipzig 1865, 页 108—139.

夫的生平及学术发展过程(立场都各有偏颇)。20 世纪上半叶,沃尔夫研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则在于,沃尔夫不仅被赋予了在思想史上比莱布尼茨、托马修斯更加重要与独立的位置,而且研究者们还进一步指出了沃尔夫哲学的路德宗信仰与经院哲学的思想背景^①。同时,自 1964 年起,沃尔夫著作首次以全集形式开始结集出版(分为德语作品、拉丁语作品、资料与文献三个部分)。可以说,沃尔夫及其作品在经历了从几乎被人们彻底遗忘到重又被发现与重视之后,有关沃尔夫的大量研究自此才真正出现。同时,伴随着人们对启蒙运动研究兴趣的与日俱增,沃尔夫也开始被一致认为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学者们认为,沃尔夫对于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沃尔夫是他之后两、三代学者^②的语言来源和精神来

① 参见 Wundt, *Die deutsche Schulphilosophie im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Tübingen 1945; Schöffler, *Deutsches Geistesleben zwischen Reformation und Aufklärung. Von Martin Opitz zu Christian Wolff*, Frankfurt am Main 1956.

② 参见 Hinske, “Wolffs Stellung in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in: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Interpretationen zu seiner Philosophie und deren Wirkung*. Studien zu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edited by Werner Schneiders. Hamburg 1983, 页 306—319, 他列举了两组学者: (a) Johann Peter Reusch (1691—1758), Georg Bernhard Bilfinger (1693—1750), Ludwig Phillip Thümmig (1697—1728), 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 Friedrich Christian Baumeister (1709—1785),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 以及 Georg Friedrich Meier (1718—1777)——这第一批学者或多或少是正统的沃尔夫主义者,他们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原初的形式上,都接受了沃尔夫体系,并通过编订大量教科书、将沃尔夫哲学体系迅速传播至全德国; (b) Johann Georg Sulzer (1720—1779), Johann Heinrich Lambert (1728—1777), 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 Johann August Eberhard (1739—1809), Ernst Platner (1744—1818)——这组学者则是独立的沃尔夫主义者,他们在形式上进一步脱离了沃尔夫的数学方法、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尽管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但仍然受到沃尔夫的很大影响、或者也部分地受到沃尔夫第一批弟子的影响。

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沃尔夫创立了德国第一个哲学学派。我们知道,在17世纪时,采用民族语言进行哲学研究在英国、法国就已相当兴盛,而在德国这片聚集着大小王国的土地上,学院哲学(Schulphilosophie)所主要使用的学术语言仍然是在精确性上比德语更胜一筹的拉丁语^①,这被普遍认为是德语文化落后于当时英法文化的象征。直到沃尔夫的出现,他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德语科学术语和德语哲学的体系化,从而德语才得以在学术价值上开始同法语、英语并驾齐驱(当然,沃尔夫在当时是凭借他的拉丁语作品获得了他在整个欧洲的声誉)。事实上,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要让人能够“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来清楚地明确地谈论道德和政治”^②。在德国,是沃尔夫为德语哲学奠定了基石。

其次,1723年前后这场由沃尔夫中国演讲引发的争论对德国哲学发展具有指向意义。正如著名德国启蒙运动研究者冯特(Max Wundt)早就所说,“这场争论可谓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一次关键事件,通过这一争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德国启蒙运动的内容。”^③这场争论主要在沃尔夫和哈勒虔敬派神学家郎格(Joachim Lange)之间展开。郎格所代表的反沃尔夫路线则由吕迪格(An-

① Wolfgang Ratke(1571—1635)及其追随者曾大力倡导德语教学,但并未得到积极响应。莱布尼茨的大量作品使用法语,也曾少量作品中使用德语写作。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于1687年首次在大学使用德语开授讲座课。他也以德语进行哲学写作,但仍然使用很多来自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术语,未能形成一套固定的术语体系和完整的哲学体系。

② 参见 Schneewind, *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 A history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1998, 页432。

③ 参见 Wundt, “Christian Wolff und die deutsche Aufklärung”, in: *Das Deutsche in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edited by Theodor Haering. Stuttgart und Berlin 1941, 页233。

dreas Rüdiger, 1673—1731)、吕迪格的学生霍夫曼(Adolf Friedrich Hoffmann, 1703—1741)、霍夫曼的学生克鲁修斯(Christian August Crusius, 1715—1775)乃至康德得到延续。虽然沃尔夫被对方指控为是决定论者和无神论者,但争论的焦点并不纯然是哲学和宗教的对立以及哲学自由和宗教迫害的问题。沃尔夫哲学首先针对的是一种反智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反对一种建立于理性之上的自然神学,并强调意志和情感相对于理性具有的优先地位。而沃尔夫认为,人们不应给知识施加任何不必要的限制,因为哲学(Weltweisheit)是“一门关乎所有可能事物的科学,它研究事物如何可能以及为何可能”^①,科学就是一种通过合法推论从确定不变的原则推导结论的品质(habitus)。对启示神学的证明工作,只有在“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贯穿在一起之后,才能得以完成”^②。在其论敌看来,沃尔夫的哲学立场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世界运行之绝对必然性以及对上帝的存在和灵魂自由的否定,而这些恰恰是沃尔夫所要极力避免的后果。因此,这场争论的主题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它既关涉上帝与世界关系的奇迹问题和道德自主性的可能性问题,也关涉到一般理性知识的界限问题和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如果撇开了沃尔夫,我们就会难以理解这些问题何以在德国启蒙运动中成为核心议题。

最后,在德国启蒙运动中,沃尔夫哲学的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它还在学院之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沃尔夫非常强调理性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他反对当时那种将理性真理与道德实践或者生活技艺割裂开来的惯常态度。他于1718年出版过一本德语小

① *Deutsche Logik*, WW I, Bd. 1, Vorbericht, § 1.

② *Christian Wolffs eigene Lebensbeschreibung*, hrsg. Heinrich Wuttke, Leipzig 1841, 页 143.

书《发现粮食奇迹般增产的真正原因》^①，此书在当时是一本将自然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的先锋之作，直接影响了 1738 年德国第一本所谓“农民启蒙”(baueraufklärerisch)之书《为认真好学的农民而作的可靠指南》^②。沃尔夫在《粮食》一书前言中将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真理比喻为“面包”，将其他真理比喻为“珠宝”，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需要面包，所以哲学家和学者不应只是为了乐趣而追求真理本身，而更应该研究那些能促进人类福祉的真理。沃尔夫这本以德语写就的小书，也被视为“大众启蒙”(Volksaufklärung)的先声之一。同时，沃尔夫的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德国 18 世纪众多所谓秘密社团(geheime Gesellschaften)的发展，学者们正是借这样的私人社团来使哲学对生活和政治产生影响^③。

① 《发现粮食奇迹般增产的真正原因，同时对树木植物的生长进行总体阐明，是为植物生长研究之第一篇论文》(*Entdeckung der wahren Ursache von der wunderbahren Vermeyrung des Getreydes, dadurch zugleich der Wachsthum der Bäume und Pflanzen überhaupt erläutert wird, Als die erste Probe der Untersuchungen von Wachstume der Pflanzen, heraus gegeben*)(1718), WW I, Bd. 24, 此书在 1734 年还有英文译本出版。详见作品列表。

② 参见 Johann Caspar Nägeli, *Des Lehrnsbegierigen und Andächtigen Landmanns Getreuer Wegweiser; Zur Beförderung der Ehre Gottes und gemeinem des Landes Nutzen ans Liecht gestellt* Von Joh. Caspar Nägeli, Zürich 1738; Böning und Siegert, *Volksaufklärung. Biobibliographisches Handbuch zur Popularisierung aufklärerischen Denkens im deutschen Sprachraum von den Anfängen bis 1850*, Vol. I,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0, 页 32, 65; Menzel, *Vernakuläre Wissenschaft ft. Christian Wolffs Bedeutung für die Herausbildung und Durchsetzung des Deutschen als Wissenschaftssprache*, Tübingen 1996, 页 236。

③ 例如 1736 年由曼陀菲尔伯爵(Ernst Christoph v. Manteuffel)建立的“真理之友”(Societas Alethophilorum)。参见 Hinske, “Wolffs Stellung in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同上, 页 312。

此外,这里也有必要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说法进行一个说明。人们通常习惯把沃尔夫与莱布尼茨捆绑在一起,认为离开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就没有独立的地位。但其实在考察沃尔夫哲学与莱布尼茨哲学二者间关系时,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层次:(1)沃尔夫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莱布尼茨学说的影响;(2)沃尔夫的学生在多大程度上用沃尔夫哲学体系来理解和解释莱布尼茨哲学。而所谓“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其实应从第二种意义去理解,因为第一个以“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称论其形而上学的人是他的学生比尔芬格(Georg Bernhard Bilfinger, 1693—1750)^①。而就第一层次来讲,则不仅沃尔夫本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而且已有的研究也认为这一说法与实际并不相符^②。首先,从两人的通信来看,沃尔夫是在近 26 岁之时才

① 这是依照沃尔夫自己在《自传》中的说法:“我在写作《德语形而上学》时,莱布尼茨的《神义论》以及他与克拉克的论战书信集已出版,因此我就在存有论、宇宙论以及理性心理学部分引入了他的几个概念、使之与我的体系相一致。而人们一般把我的哲学称为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则是肇始于比尔芬格先生,他最先称我的形而上学为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莱布尼茨先生本来希望我能像伯努利先生(Jakob I. Bernoulli)一样关注于更高级的几何学研究和发展他的微分学;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则是,为了[灵魂]高级能力之故去改善哲学。因此我当时并不想在通信中同他讨论他的哲学思想,正如他自己也在他给法国雷蒙(Remond)的信中说过,这可参见著名的《莱布尼茨、克拉克、牛顿等有关哲学、自然宗教、历史、数学等的文章汇编》(*Recueil de diverses pièces etc.*),所以除了莱布尼茨的正式出版物之外,我不可能对他的想法有任何了解……因而他认为我之所以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是因为我平日工作量太大——他知道我不仅每天至少要阅读六小时,而且还要在《学者札记》(*Acta Eruditorum*)上发表很多书评。”参见 *Christian Wolffs eigene Lebensbeschreibung*, hrsg. Heinrich Wuttke, Leipzig 1841, 页 308—309。

② 参见 Corr, “Did Wolff Follow Leibniz?” in: *Akten des 4. Internationalen Kant-Kongresses, Teil III*, edited by Gerhard Funke, Berlin 1974, 页 11—21。

开始与莱布尼茨通信^①，而且两人在信中也极少讨论哲学^②。莱布尼茨无疑对沃尔夫的哲学产生过影响，但在哲学上对沃尔夫产生过影响的还有笛卡尔和钦豪斯^③。其次，如沃尔夫本人所说，“除了莱布尼茨的正式出版物之外，我不可能对他的想法有任何了解”。莱布尼茨也有句著名的话：“只是通过我的出版物来了解我的人，都并不了解我”。因为当时学界能看到的莱布尼茨著作只有 1710 年出版的法文版《神义论》（由 Gottsched 于 1744 年译为德语）、1717 年出版的《莱布尼茨与克拉克书信》论战集、《单子论》（1720 年由 Heinrich Köhler 译为德语）以及莱布尼茨在《学者札记》（*Acta eroditorum*）上发表的文章。最后，从内容上来看，沃尔夫哲学和莱布尼茨哲学也根本无法等同。例如，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在当时更多是个缺少论证的假设，所以人们感觉通过沃尔夫的灵魂学说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但尽管如此，沃尔夫认为并不应就此将他的灵魂学说视作对莱布尼茨“预定和谐”的解释，因为这一假设只是正好与他自己关于身心关系的系统论证相合而已^④。

① 沃尔夫向莱布尼茨写的第一封信是在 1705 年 12 月 20 日。参见 *Briefwechsel zwischen Leibniz und Christian Wolff. Aus den Handschriften der Koeniglichen Bibliothek zu Hannover*, hrsg. Gerhardt, C. I., Halle 1860。

② 莱布尼茨生前的出版物很少，因此他主要通过书信来和其他学者交流他的学术观点。

③ 钦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 1651—1708）被称为是“第一位德国斯宾诺莎主义者”（der erste deutsche Spinozist）。沃尔夫在《自传》中说，在布雷斯拉学习神学期间，“当时我对经院学者的评价比现在更低，因此产生了学习笛卡尔哲学和阅读钦豪斯《心灵医学》（*Medicina mentis sive artis inveniendi praecepta generalia*）的强烈冲动，而这些书我当时是没有的”，沃尔夫还将博士论文《普遍实践哲学》托人交给钦豪斯审读，钦豪斯还称赞这部作品是其《心灵医学》结出的“果实”，参见 *Christian Wolffs eigene Lebensbeschreibung*. Hrsg. von Heinrich Wuttke, Leipzig 1841, 页 294, 305。

④ *Deutsche Metaphysik*, WW I, Bd. 2. 1, Vorrede zu der zweiten Auflage.

(二) 中国演讲历史背景

1. 沃尔夫与中国经典

沃尔夫于 1721 年所写的中国演讲主要依据卫方济翻译的拉丁文版《中华帝国经典》^①(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和朱熹所作的《小学》^②六部)。而他于 1726 年为该演讲所作注释则主要依据柏应理等人翻译的拉丁文版《中国哲人孔子,或中国科学》^③(包括一篇 106 页的“绪论”、一篇 8 页的“孔子生平”,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后附有柏应理翻译的“中国朝代年代表”^④)。之所以采用两个不同的版本,这一方面是由于柏应理译本中的绪论、孔子生平和年代表为沃尔夫提供了更多例证;另一方面,按照沃尔夫的说法(见演讲注释 3, 54, 85, 113),虽然他本人更欣赏卫方济的译本(不仅因为卫方济译本更全,也因为他认为卫方济译本在一些关键概念上翻译的更符合原文的意思;见演讲注释 54, 85, 92),但由于柏应理的译本在当时更加常见,所以为了便于读者查找原文,他在注释中引用中国经典之时采用了柏应理译本。笼统而言,这两个译本的差异主要在于:柏应理译本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产物,其翻

① Noël, P. Francisco,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nimirum Adulorum schola, Immutabile medium, Liber sententiarum, Memcius, Filialis observantia, Parvulorum schola, E sinico idiomate in latinum traducti*. Prag 1711.

② 有不少中、外文献把卫方济翻译的《小学》错误地当作是《三字经》。

③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t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 Philippi Couplet, Patrum Societatis Jesu. Paris 1687.

④ 这份年代表并未以基督纪年方式、而是以 60 年一循环的甲子纪年方式记录每位帝王的事迹,仅在每一甲子第一年标记相对应的基督纪年年份。

译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主要依据张居正的《四书直解》，并且为了向罗马教廷证明耶稣会适应性传教政策的正确性，而特别强调原始儒家那里存在上帝信仰^①；而卫方济译本主要依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该译本既没有论证原始儒家上帝信仰的前言、也没有在翻译中穿插译者的附会性注释，相较前者而言少些教派色彩。

实际上，沃尔夫对中国书籍的接触则要早于 1721 年的中国演讲。在《学者札记》1711 年 9 月刊上，他曾发表过一篇对卫方济 1710 年出版的《印中数理观察记 1684—1708》^②的书评^③。这部书为沃尔夫提供了有关中国历史、年代、地理等方面的详细知识。随后，沃尔夫阅读了 1711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经典》，并在《学者札记》1712 年 3 月刊上发表了对这本译著的书评^④。在此后的几年中，沃尔夫发表的作品仍主要与数学、物理有关。直到 1720 年，他在《德语形而上学》中提道：

① 尽管耶稣会士指斥宋明理学家的无神论立场，认为自己是从小原始儒家文本出发去证明古代中国人也知道造物主，但是他们的译文、包括经典选择本身无疑都在依赖宋明理学家的注疏和诠释。张居正的四书直解当然是典型的理学家作品，因此选择《四书直解》更像是个鸵鸟办法。

② Noël, P. Francisco, *Observationes mathematicae & physicae in India & China factae ab anno 1684 usque ad annum 1708*. Prag 1710.

③ 参见 *Acta Eruditorum*, September 1711, 页 383—400, 或者 *Sämtliche Rezensionen in Acta Eruditorum* (1711—1718), WW II, Bd. 38. 2, 页 573—590。沃尔夫自 1705 年起就成为《学者札记》的固定书评人，除了写新书书评以外，也发文推荐他认为有价值的作家的文章。最初他的博士论文就是通过他在莱比锡哲学系认识的 Otto Mencke 的推荐，而借《学者札记》获得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④ 参见 *Acta Eruditorum*, März 1712, 页 123—128, 224—229, 或者 *Sämtliche Rezensionen in Acta Eruditorum* (1711—1718), WW II, Bd. 38. 2, 页 624—629(未录全)。

莱布尼茨先生发现了这条原则[充足理由律]的重要性,阿基米德很早就已将其平衡学说建立于这条原则之上,更早还有孔子,他在其道德学说和国家技艺中也看到了这条原则^①。

在沃尔夫于1721年4月18日为第一版《德语政治学》所写的前言中,他直接指出中国是一个运用理性治国的国家,并计划就此进行专门的写作:

在一个尽可能以理性治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他的快乐……中国人从古时起就致力于治国的技艺;而我在他们的作品中通过反复验证所努力发现的内容,正与我的学说相合。那么,既然这个民族在治国的技艺上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并以此而远近闻名;因此我很想用我的方法对他们的准则进行证明。也许我可以找个机会,把中国人的道德学说和国家学说以科学推理的方式展现出来,由此也可以清楚看到他们的学说和我学说的和谐一致。^②

这段话写完不到三个月,也就是在1721年7月12日,沃尔夫就以中国人的实践哲学为其卸任演讲的主题,试图向听众展示中国哲学的最终原则。

在被驱逐出普鲁士之后,沃尔夫除了在1726年为其正式出版的中国演讲增加了篇幅远大于演讲原文的研究性注释以外,而且在马堡所写的一系列拉丁语作品中都多次地引用有关中国的例证。例如在1729年冬季学期的讲座《论系统知性和非系统知性之

① *Deutsche Metaphysik*, WW I, Bd. 2. 1, § 30.

② *Deutsche Politik*, WW I, Bd. 5, Vorrede, 页10(原文未标页码)。

区别》中,他就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孔子、笛卡尔和纽曼^①视为具有系统知性(intellectus systematicus)的哲学家:

中国人的伟大哲学家孔子,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有系统知性的自然倾向;因为他的观念中所包含的东西,不仅展示了他的深刻洞察力,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以极美妙的方式相互联结,从而如果一个人既具有系统知性、又具有与孔子言行相对应的概念,那么他就能将孔子极为清楚、但还不够明确的观念中所包含的真理在一个有序的系统表达出来。……但对于孔子来说,这一系统知性的自然倾向并非多余无用,否则孔子就不会得到关于道德和政治事物的独特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已构成了一个非常美妙、且与真理相合的系统。^②

在1737年出版的《自然神学》第二卷“论无神论”部分中,在论证“不知道上帝存在的人也能够追求好的行为、避免恶的行为”时,沃尔夫又以孔子为例证:

他[孔子]没有关于上帝的明确概念,不知道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因为他从没提过这些,也从不借上帝的属性来获得行善的动机。尽管如此,他仍过着一种可赞扬的生活,他一生都在努力追求德性、并且也指导别人如此。因此那些因传教事业而被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他们第一次将这位

① Kaspar Neumann(1648—1715),著名的布雷斯劳神学家。沃尔夫在自传中说自己在布雷斯劳学习神学期间读过纽曼的布道词和教材,从中获益颇多。关于此人,参见 Schöffler, *Deutsches Geistesleben zwischen Reformation und Aufklärung*, Frankfurt 1956.

② “De differentia intellectus systematici et non systematici”, in: *Horae subsecivae*, WW II, Bd. 34. 1, S. 117.